

• 文史纵横 •

正定巨碑出土十年考(下)

樊志勇

(正定县文化促进会会长 河北 正定 050800)

(接上期)

5. 在安重荣与李宝臣的“这两通巨碑之间”, 不“应该就是唐代到五代时期成德军节度使的藩帅府第”。正定古城自东晋永和八年(352)四月燕慕容恪取常山筑安乐垒于此, 后398年正月, 北魏道武帝移常山郡治于安乐垒, 历隋入唐并在盛唐时期稳定了真定城郡、府治所的政治地位。又自“安史之乱”至天福年间安重荣立碑, 不论为郡、为府、为军, 其地方最高政权的官署衙门在真定城内均应占据为首的尊贵之地, 即其郡衙、府衙、成德军衙门一直都是建在真定城内中轴线北大街西侧高台上——今正定县府所在地。今正定县府前的常山路是解放后于1959年始规划、拆迁、修建的正定迎宾大道, 从前并无此路。而今正定华阳宾馆的东南角处, 原本是真定府门前钟鼓楼所在地。穿钟鼓楼南去, 依次是衙门口、府前街至今中山路(横贯东、西城门间的大道)。从前此街口有一座木质素色高大的牌坊, 上书“古常山郡”四个大字, 这里一直是进出真定府衙的正道。安重荣德政碑出土处与今常山影剧院处的李宝臣纪功碑, 两碑并立于真定衙门口之南、府前街中间地段的一左一右, 东西相距约90米。《初探》中亦写有:“北宋时期欧阳修出任河北西路都转运使期间, 曾在真定府署(今县政府大院)对面隋龙藏寺旧址(今发掘巨碑地点的北侧)发现了《隋龙藏寺碑》, 并在他的《集古录》中有明确记载。《集古录》载:‘龙藏寺碑, 齐张公礼撰。龙藏寺已废, 今在常山府署之门, 书字颇佳’。欧阳修发现龙藏寺碑的地址, 距离目前发掘巨碑的地点仅50米左右距离。”《初探》中的此段记述, 一是确切地表明北宋时期真定府署已在今正定县府所在地; 二是说明龙藏寺地址、龙藏寺碑及李宝臣纪功碑在北宋时期, 均已立在正定府署衙门口之南今府前街的东西两侧; 三是说明安重荣碑北50米左右原立有龙藏寺碑, 而龙藏寺碑又立于府署之门西南处。既然北宋时期的真定府署衙门就在今县府所在地, 那么, 成德军的衙

门应在何处呢? 笔者认为唐代及五代时期, 成德军自761年被唐肃宗命名以后, 这些节度使统领掌管着真定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最高权力, 不论成德军的第一任节度使李宝臣也好, 还是安重荣也好, 及安的继任者们, 他们的衙门也均应设在他们之前真定城内最高政权的官署所在地。各节度使由于忙于战事等, 一般都是“至于旧第”, 北宋时期府衙不可能是宋之初新选的地址所建, 其所在地应该就是五代时期及唐代时期成德军的衙门。不论哪一位节度使的碑, 均应是立在成德军衙门口——今正定县府之南府前街北、中段的两侧。所以说, 成德军的官署衙门同北宋时期的府署均应都是在今正定县府所在地。而安重荣、李宝臣两碑之间约90米之内, 又怎么可能“充分说明, 在这两通巨碑之间, 应该就是唐代到五代时期成德军节度使的藩帅府第。这是当年真定城内最威严宏伟的建筑, 在近两个世纪里, 一直是直接控制真定及其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指挥中心”呢。

6. 对出土残碑两句碑文的解读: ①残碑中刻有“……疲俗水为船而陆为驥岂让夷吾金如粟而马如羊未惭张奐……”的碑文, 《初探》将此断句并解释为“‘岂让夷! 吾金如粟, 而马……’, 显然是夸耀镇州金银如粟一样多, 马匹强壮, 其能畏惧契丹蛮强。”笔者认为此碑文中的“水为船而陆为驥”对应着“金如粟而马如羊”, 而上句中的“岂让夷吾”, 则对仗着的下句的“未惭张奐”。夷吾: 春秋初的政治家, 姓管, 字仲, 名夷吾。助齐桓公改进宗制、富国强兵, 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张奐: 东汉大将, 公元前167年, 任武威太守时, 实行平徭均赋, 革除了凡是二月、五月出生的孩子及与父母同日生者全部处死的当地陋习, 百姓便与他生为立祠, 以示爱戴。残碑中的此对称句是碑文作者太子宾客任赞在盛赞安重荣的德政, 不仅可与当年的管仲相比, 亦不逊色于东汉的张奐。如将夷吾的名字拆开说成“岂让夷! 吾金如粟而马……”, 并把“岂让夷”解释为“岂

能畏惧契丹蛮强”就是借给任赞十个胆,这位奉石敬瑭敕的太子宾客,也是决不会撰写得罪石已“父事”了的契丹的。②《初探》文中写道:“安重荣喜欢使用铁鞭为武器……号‘铁鞭郎君’。在残碑文字对碑主人的盛赞中有‘戟射小枝,孰偕勇略,鞍横长槊’。槊,就是铁鞭。这都与安重荣身份相符”。其实,槊与鞭皆为古代兵器。槊是由矛与棒演变而来的。《正字通》一书中云:“矛长丈把谓之槊”。《现代汉语词典》中:槊,是杆儿比较长的矛。《三国演义》中曹孟德当年不是曾横槊赋诗么。而鞭则是用铁制成的有节而没有锋刃的短兵器。槊,又怎能就是铁鞭呢。再《初探》文在引用上句残碑文字时,并将碑文中的“戟射小枝”误识为“戟射小技”。戟:古代一种在长柄一端装有青铜或铁制成的枪尖、旁边附有月牙形锋刃的兵器,这月牙形的锋刃又叫做戟小枝。《三国演义》第十六回说的是吕布在一百五十步开外、辕门射戟为纪灵与刘备解和之事:“当下,吕布一箭正射中画戟小枝。”“戟射小枝”的碑文盛赞的是碑主人“善骑射”、并亦有百步之外一箭能射中戟小枝的精湛箭术。

窥残碑记事,窥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与契丹

五代是处于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一个短暂分裂的时代,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公元907年至960年,中原地区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南方以及北方的山西地区,又出现了十个大小格局的政权,史称“五代十国”。五代前后53年,时间短暂,战事频繁。真定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戈兵扰攘,几无虚日。在出土残碑中,其中有6块带字残碑,对研究此碑内容及五代时期真定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特别是对研究成德军与后唐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有其重大参考价值。

在唐末政治陷入混战的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乘机发展起来。公元907年,在朱温自称后梁皇帝的同一年,耶律阿保机当上了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至916年,耶律阿保机自号皇王,定国号大契丹,建年号神册。这期间,契丹人不断南下,吞并中原土地。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皇帝李嗣源顺应广大军民意愿抗击契丹南侵。921年12月,阿保机攻幽州,陷涿州,直至定州,李存勖本来正在攻打镇州的张处瑾,立即率领军队攻打契丹,第二年正月在新乐败契丹兵,又在望都大败契丹,一直追到幽州。923年李存勖在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等大将支持下,灭后梁建后唐,即位于邺(今大名县城东北),改元同光。同光元年4月,改镇州为北京,至十一月,复改为成德县。924年正月,契丹侵扰,庄宗命李嗣

源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将兵救幽州。925年,诏以李嗣源为成德军节度使,坐镇真定,声援幽州抗击契丹。李存勖当了四年的皇帝“遇内乱而崩”,后庙号庄宗。926年李嗣源当了皇帝,改元天成,后庙号明宗。残碑中有“……明宗皇帝任之……”,可惜因其前后均无文字相连,不知“任之”当为何意。其可能意应该有二:一指《资治通鉴》中记有明宗皇帝在925年任职过成德军节度使;二是残碑中有“上在北京日授光禄……”的记述。其“上”应是指皇帝石敬瑭,“北京”是指今太原,而不是指今正定。“授光禄……”等官职是“明宗皇帝任之”诏授给石敬瑭的:《旧五代史·高祖纪一》中,有“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嘉帝光禄大夫、检校司徒”的记述,帝指的是石敬瑭。

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的帝王,但他没有培养出有能力的继承者。926年至930年明宗皇帝在位5年后,他的几个亲戚,如掌握兵权的石敬瑭、赵延寿、杜重威等先后一个个向契丹投降,与后唐为敌。继明宗后的闵帝李从厚十分软弱,很快被明宗的养子末帝李从珂杀掉。这李从珂与真定还真有关系,史载从珂本姓王,其母魏氏,镇州平山人也。明宗养以为子,后名曰从珂,因常立战功,明宗封其为潞王。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记载:李从珂和石敬瑭都是由于有勇力、善斗,事奉明宗时为左右近臣,但是两人在心中都互相竞争,一向并不友好。李从珂即位皇帝后,石敬瑭不得已,只得入京觐见。身兼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三要职的石敬瑭,久居太原,拥兵自重。为削其权,936年五月初三,李从珂诏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把石从晋阳(太原)欲调郛州。石不肯,便与他的将佐们计议说:我第二次来河东(今太原西南)时,主上曾当面答应我终身不再派别人来替换我,如今又忽然有了这样的命令,我假如不造反,朝廷要先发制人,岂能束手就擒死于道路之间呢!众人皆极力主张抗拒朝廷的命令。掌书记桑维翰劝石北联契丹举事反唐。

936年五月初十,石敬瑭自晋阳起兵反叛。五月二十,后唐末帝李从珂发兵讨石,大兵压境,围石于晋阳。五月下旬,原本在代北地区戍守的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帅步骑五百奔晋阳”投靠石敬瑭。石命掌书记桑维翰草写表章向契丹主称臣,对比自己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至八月初,后唐的军队“筑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重荣、张万迪降兵皆隶焉。知远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石敬瑭亲乘

城,坐卧矢石下”,晋阳城池坚固,唐军急攻不下。《资治通鉴》中的上述记事,在残碑中有着相同记述:“赏劝时属伪庭失德,群盗挺[起]……。”赏劝,是指末帝李从珂下诏委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把石从晋阳调郢州一事;伪庭,是指末帝李从珂的朝廷。《旧五代史》有“伪将张敬达引军逼城设栅”的记述,说的是末帝李从珂命大将张敬达率大军围石敬瑭于晋阳之事。残碑中的“外则亲当矢[石]”,“内则设固金汤”指的是在晋阳守城战中,石敬瑭为鼓舞士气,亲自登城坐卧在围军的矢石投射之下,视察部属兵卒,守城将士齐心协力,城池防御坚不可摧。残碑中的“[遵]带砺而誓山河,别[]良史,公竭诚佐”。因晋阳守城战是安重荣等众将辅佐及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推翻后唐建立大晋王朝的第一次重大战役,所以太子宾客任赞在碑文中以重笔称赞晋阳之战对大晋的建立是意义重大的关键之战,不论时间多久远,都将永载千秋史册。而在这次大战中,“公竭诚佐”。“公”指的是安重荣。这是一句极高评价的赞誉之辞,用以褒奖、盛赞安重荣竭尽忠诚、全力辅佐石敬瑭灭后唐之事。这应该是安重荣德政碑中记述的安的主要功绩之一。

公元936年九月,契丹耶律德光率骑兵五万援救石敬瑭,并大败后唐军。残碑中的“远扈万乘,来定三川”与《资治通鉴》中“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谷而南,旌旗不绝五十余里”,“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的记述写的都是契丹五万骑,自扬谷而南三千里赴晋阳助石敬瑭反后唐建后晋之事。这一年的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并尊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石敬瑭割十六州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历史后果,这一疆域连接辽宁东部至山西北部,地形险要,是中原王朝防御北方侵扰的天然屏障。契丹人过了这一区域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中原地带无险可守。导致中原王朝藩篱尽失,军事上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从而使中原王朝数百年来一直置于北方势力的虎视之下,迫使其每年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加强防御,此影响并制约了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间接导致北宋王朝的灭亡。后晋政权不过十数年,而灭了它的正是当初扶植他的契丹。正所谓割地而误国、借兵而亡国。

天福二年(937)正月,石敬瑭拜安重荣为成德军节度使。时晋新得天下,石靠卖国登极,遭人唾骂,又兵火之余,国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安虽系武夫,但通晓文吏之事,在任期间勤于

政事,务农桑以实仓廩,通商贾以丰货财,镇州一带得以保境息民。天福三年时,安重荣已对后晋高祖石敬瑭与契丹约为父子,割让幽州十六州,以为“此晋之万世耻也!”安并对契丹王朝深恶痛绝。《资治通鉴》在记天福六年(941)事中写道“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谩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以让帝,帝为之逊谢。六月戊午,重荣执契丹使拽刺,遣骑掠幽州南境,军于博野,上表称‘……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又以此意为书遗朝贵及移藩镇,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天福六年(941)腊月,安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举兵反晋,便“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石敬瑭急派天平军节度使杜重威率兵征讨。两军鏖战于宗城(今广宗)西南。安因部将反叛,被杜重威大败,仅率“十余骑走还镇州,婴城自守”。天福七年(942)正月初二“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导官兵入城,杀守陴民二万人,执安重荣,斩之。……石敬瑭命漆其头颅,函送契丹。并改镇州为恒州,改成德军为顺国军,以杜重威为节度使”。而后为消除安重荣的影响,杜将安“碑寻毁之”,并深埋于地下。

安重荣戎马一生,后虽颇觊觎皇位,天福四年时“每谓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终因不满后晋膝与契丹割地卖国,以为万世之耻,而起兵反晋。安兵败虽死,但安重荣的这种民族气节,却得到了后世的敬仰。儿皇帝石敬瑭,大卖国贼也;为石敬瑭献计勾来契丹者桑维翰被清代史学家王夫之点评说“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而王夫之点评安时却写到:“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逆,所指的是反卖国贼石敬瑭,“而名正者”是写安重荣顺民心、顺民意、反契丹而反后晋。《初探》的文作者在《破解正定千年巨碑之谜》的博客中,称安重荣“他是个叛逆”,则有悖于中原人民之民心民意。安重荣反的是契丹入侵、反的是石敬瑭卖国。

正定巨碑、赧质重见天日吊运开元寺已十余年,现整日遭受着风雨侵蚀,这尊巨型赧质其青石风化严重,特别是赧质碑座背部驼峰右侧那幅绘有端坐于麒麟之上的碑主人及14位栩栩如生随从人物、能够充分彰显五代时期正定匠人绘画水平和艺术风采的线刻画,现已模糊难辨。如不加重保护,其后果更不堪设想。建议相关部门拨款保护。

责任编辑:刘长泽